

原子弹 间谍案

哈福德·蒙哥马利·海德著



群众出版社

原子弹间谍案

〔英〕哈福德·蒙哥马利·海德 著

李家禄 关平 译 狄 奋 校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THE ATOMBOMB SPIES

本书根据纽约阿瑟纽姆公司1980年第一版译出

原子弹间谍案

(英) 哈福德·蒙哥马利·海德 著

李家禄 关平 译 狄奋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222千字 8插页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30 定价：2.00元

印数：00001—21000册

內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利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的间谍网广泛搜集原子弹情报一案曾经在西方轰动一时。作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和联邦调查局的档案材料，在书中比较系统地记述了这一案件的始末。

本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战后间谍活动的历史、特点，战后美国的政治情况及大国之间的关系等。

作者哈福德·蒙哥马利·海德，英国人，战时曾服务于英国情报机关，现为英国高级律师。由于作者的立场所限，书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请读者注意鉴别。

原子弹间谍案

• 目 录 •

- 第一章 叛逃者
- 第二章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 第三章 富克斯与蓬泰科尔沃
- 第四章 罗森堡夫妇
- 第五章 他们是否有罪
- 尾 声

第 一 章

叛 逃 者

1

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晚八时许，一个目光黯然、神态庄重的二十五岁的年轻人离开了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使馆了。此人是使馆武官尼古莱·扎鲍丁上校的主要译电员伊果尔·谢尔盖耶维奇·科坚科。这所大使馆坐落在夏洛特街285号。这是一幢用红砖建造的，铺着青石板斜屋顶的三层楼房，还有白色的门廊。这种式样在十九世纪后期是颇受欢迎的。对那些富有的市民来说，能住上这样宽敞的楼房是很惬意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它就成了苏联大使格奥尔吉·尼·扎鲁宾的外交总部。它的主楼供大使和他的外交官及其工作人员使用；后楼从前是厨房和雇员的住处，现在在装有钢制百叶窗的窗户上设有铁栏杆作为防护，并用两道铁门把它与大使馆的其它部分隔离开来。这里便是密码部门。渥太华和莫斯科之间往来的秘密和绝密电报、公文就是在这里编成密码或译成文字的。使馆的秘密文件也存

放在这个后楼里。在进入后楼时，要先按一下藏在楼梯扶手下的暗铃。随后，门卫便会打开铁门。他先通过窥视孔看一下，是使馆中经过特许的人员（科坚科是其中之一）才放行。科坚科在后楼的十二号小房间里办公。他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每天晚上他总是把用过的电码和密码手册放进一个密封的口袋里，然后把这个口袋交给值班员。值班员再把口袋连同与莫斯科军事情报局往来的日常电报和扎鲍丁上校的工作日志、记录以及在保密登记簿上注册过的其它文件一起锁进一个大的铁保险柜。这些文件都是科坚科能够接触到的。①

武官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住所办公。他住在市区的另一个地方——琅路十四号。这里备有拍摄文件用的照相机和其它器材。科坚科经常被叫到这儿来。有时一天要带着在使馆译好的电文来几趟，并从扎鲍丁上校手里取回需要译成密码发往莫斯科的电文。事实上，扎鲍丁上校指挥着苏联设在加拿大的庞大而又复杂的间谍网，就他所从事的公开军事工作而言，这已远远超出了一个武官的正常工作范围。虽然大使扎鲁宾知道这些秘密活动并对使馆的秘密情报工作负有全部责任，但他却没有直接参与这些活动。据科坚科讲，扎鲁宾无权进入使馆耳房的密室。但这更可能是他有意回避，以免招惹是非的缘故。顺便提一下，负责这些密室的是一个名叫维塔利·尼甫洛夫的。他名义上是使馆的二等秘书，实际上是这里的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的头子。再补充一句，格奥尔吉·扎鲁宾是个有卓越才能的人——他在十

① 伊果尔·科坚科：《这是我的选择》英文版，第208页。

三岁便开始了工人生涯。二十七年后，他已当上外交部副部长。他还曾任苏联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

秘密情报机关的重要职责是必须细心地保护情报来源。一次，扎鲍丁上校受到莫斯科方面的指责，因为他对一份关于大不列颠和苏联之间战后贸易提供贷款的报告暗示了它的来源。表面上可以判断出，这份报告是从英国驻渥太华的高级办事机构的雇员那儿搞到的。尽管年轻的科坚科还不知道扎鲍丁电报中提及的大部分秘密人员的身份，但由于他们总是用不同的暗号称呼，他便很快地掌握了这个谍报网的内幕。他清楚地了解到，他的顶头上司正干着反对一个国家的罪恶勾当，而科坚科却向往和羡慕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扎鲍丁上校在最近召开的工作人员会议上极力纠正科坚科的这种思想倾向，他说：“昨天是盟友，今天是近邻，明天他们就会变成我们的敌人。”尽管扎鲍丁这样说，但科坚科却依然疑惑不解。

伊果尔·科坚科是个学工程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他已得到了苏联军队的中尉军衔，但在一九四三年夏天，他被作为“普通雇员”派往渥太华之前，又在莫斯科的苏联军事情报学院受到仔细的审查和训练。他希望携带妻子和母亲一起去渥太华，但却得到通知说，不能带母亲去（妻子可以同去）。显而易见，科坚科的母亲必须留在苏联作人质或担保人，以防他在国外工作期间叛逃。他感到最欣慰的是，允许妻子斯维特拉娜——他称呼她“安娜”——一同前往渥太华。当时她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她必须乘船走，而伊果尔则经北冰洋航线飞往加拿大，与他同机的还有同时就职的扎鲍丁上校。当科坚科的妻子抵达渥太华时，他来到车站

迎候。他们在渥太华郊区的一套很小的房子里住了下来，这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德烈快要出世了。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过得非常愉快。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对这种生活越来越恋恋不舍，而不想再回到莫斯科，去过那种单调无味的生活，去住那种狭窄的住房。苏联的宣传机构却将那里的生活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事实上，那里的生活与科坚科夫妇在渥太华所亲身感受到的一切根本无法相比：人身安全感，言论和评论的自由，商店和超级市场里丰盛的食品、日用品，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卧车等等，普通的加拿大市民都享有这一切。耳闻目睹的种种现实对伊果尔和安娜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当伊果尔想到在扎鲍丁办公室里从事的秘密罪恶活动时，这种影响就更大了。“一开始对加拿大人搞间谍活动，就使我反感，”伊果尔以后回忆说，“安娜的到来、小安德烈的降生以及我们在萨默塞特大街511号非常理想的公寓生活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坦白地说，看来这里的民主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我在加拿大已住了很久，足以能够正确地评价说，这里的竞选是真正自由的，出版也是真正自由的，工人不仅有言论自由而且还有罢工的自由。”

伊果尔·科坚科到渥太华十五个月以后，使他恐惧的时刻来到了，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一九四四年九月的一天下午，扎鲍丁上校把他叫到办公室，凝视着刚刚从莫斯科发来的一封外交信件，说：“局长下令立即召回你和你的家属，但没有讲明原因。”^①

当科坚科从最初的惊愕中恢复平静后，他挖空心思地想

^① 伊果尔·科坚科：《这是我的选择》英文版，248页。

找出召回他的所有可能的原因，但毫无结果。当他把这个不祥的消息告诉安娜时，她惊叫道：“倒霉的安德烈！我原以为我们的孩子会在这个国家长大成人，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把他带回到苦难、饥饿和无望的生活中去。糟透了……糟透了！”

翌日清晨，科坚科直接来到琅路，面见他的上司。他提出，武官处还很需要人，他在使馆学校学习时，英语成绩名列前茅，或许能调换一下工作，让他当名译员。

“好吧，就这样。”扎鲍丁表示同意，“但这件事得由莫斯科决定。”他补充说，在使馆增加人员之前，他将要提请上级重新考虑召回科坚科一事，这样做“更为实际”。

三天以后，他们接到莫斯科的回复：让科坚科“暂时”继续从事密码工作。对此，科坚科感到莫大宽慰。只有绝对可靠的军事情报人员才能担当编码和译码工作，因而科坚科认为，莫斯科当局依然把他看作是忠诚的苏联公民。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安娜时，她却没有任何动心。“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她说，“这只是短暂的，总有一天我们还会面临被召回国，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伊果尔深思了片刻说：“我们不回去了，安娜。安德烈应该在这个国家的良好环境中生活，你也会象个加拿大人的妻子一样生活。”他们决定在科坚科继续任职期间，收拾行装，更名改姓，在加拿大或美国隐居下来。

这样决定之后，他们便开始拟定今后的计划。他们商定，决不能走漏任何风声，被召回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他们无疑将选择其它的路，而不执行这种命令。

实际上，要把他们召回苏联，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而

伊果尔当时还不完全知道内情。这就是有一天晚上，他忘了把一份绝密文件——大概是一封电报——锁进保险柜。他把这份文件和办公桌上的一摞不重要的文件混放在一起。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文件仍在昨天下班时放的地方，好象没人动过。尽管这件事可以马马虎虎地蒙混过去，但他内心还是感到恐慌。为了安全起见，他向扎鲍丁上校汇报了自己的过失。扎鲍丁是个和蔼可亲的武官。他深知，如果向莫斯科报告此事，科坚科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因而他情愿给科坚科上一节课，讲讲译电员保守机密的重要性，而没有向上汇报。遗憾的是，这份文件却被俄国女清洁工（她是苏联内务部的特工人员）看到了，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维塔利·巴甫洛夫，而巴甫洛夫又向莫斯科作了汇报。结果是扎鲍丁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科坚科再次被召回国。据悉，一位粗心的译电员曾因相同的罪过而面对行刑队的枪口。

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一天，莫斯科下达了命令：“由库拉科夫中尉接替科坚科，他已在途中，科坚科负责教他使用密码。库拉科夫学会使用以后，科坚科把工作移交给他并立即偕家属回国。”而这时，安娜又怀孕了。

“你为这个国家和你自己做一番大事业的时机到了，更要紧的是为安德烈和即将出世的孩子着想。”安娜固执地说，“咱们得在加拿大安家了，咱们别想什么好处都占，又什么都不舍得。”

现在，伊果尔决定搜集证实几年来苏联在加拿大间谍网的活动材料。时间很紧迫，他意识到，如果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目的，必须不失时机冒风险去干。使馆里那些上面印有“阅后销毁”的秘密文件，通常经他整理后送进焚销炉

内，而他则开始有意把它们保留下来。他还从卷宗中抽出一些文件带回家，藏在罐子里、炊具中和盘子下面。他誊写了两份他认为非常重要而可能会被发现丢失的电报。他把电报抄件放进卷宗，而把两份原件带回了家。其中一封是从莫斯科发来的，询问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另一封是扎鲍丁向上司发出的，他的代号是“格兰特”，他报告说共产党人弗雷德新近当选为加拿大联邦议会议员。科坚科仔细检查了所有秘密文件和机密卷宗，并且把那些他打算最后离开大使馆时带走的电报和绝密文件都折角做了记号。

九月五日，他稍微提前一会儿回家吃晚饭。他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当天晚上扎鲍丁家的值勤军官库拉科夫中尉——他会第一个注意到科坚科不在使馆——在次日中午之前是不会来上班的。另外，扎鲍丁本人要去参加一个聚会，几乎可以断定，最早要到中午才能返回。

他来到武官处，证实了库拉科夫中尉确实在扎鲍丁家值勤。一些同事邀请科坚科去看电影，他又以看过为借口谢绝了，然后向大使馆走去。当他在登记本上签名时，他惊愕地看到苏联内务部在加拿大的头目巴甫洛夫正在接待室里。但是当他按楼梯扶手下的暗铃时，巴甫洛夫好象没有注意到他。幸好，商务专员的译电员雷阿扎诺夫给他打开了铁门。雷阿扎诺夫是科坚科的朋友。雷阿扎诺夫问他是不是要干得很晚。科坚科回答说：“不，只有两份电报要处理一下，八点半我还要赶去看演出呢！”雷阿扎诺夫说这个主意不错，可惜他不能同他一起去看节目，因为他是当晚的值日官。

科坚科来到他的办公室，小心翼翼地关好门。他在桌前挪开自己下午放在桌上的扎鲍丁的装有文件的那个密码文件

包，然后坐下来把那两封电报译成密码。这两封电报初看好象并不重要，但经过仔细斟酌，他认为这两封电报与其它的情报有关系，并且发现它们是出自一个代号叫娜拉的情报员之手。科坚科知道这个人在加拿大外交部工作。她的真实姓名是埃玛·沃凯。他决定把这两封电报放到他已经搜集的材料中去。他本来可以把电报留给库拉科夫中尉第二天处理，但他没有这样做。“这件事对埃玛来说太不利了，使得我停下来重新考虑如何处置它们了。”他后来回忆说，“这两封电报使她坐了三年牢。”接着，他把卷宗中标有“密件”的文件都取了出来——共计一百余件——装进衣袋，剩下的塞进内衣。最后，他穿过走廊，把那两封电报交给雷阿扎诺夫发往莫斯科。他又把密封了的扎鲍丁的文件包交给他放进保险柜里，包中装有武官的密码本。他以为雷阿扎诺夫可能会注意他那鼓鼓囊囊的口袋和衣服，但他却没有注意。科坚科出门在登记簿上签名时，门卫也没有注意他。门卫也是苏联内务部的成员，叫古塞夫。古塞夫只是向科坚科微微点头。幸好，这时巴甫洛夫早已走开了。

走出使馆大门，科坚科立刻搭上一辆开往市内的有轨电车。下车后，他便身负重任地径直向皇后街的《渥太华日报》报社走去。

2

伊果尔·科坚科来到报社时已经快九点钟了，报社已经开始印刷晨报。他打听到编辑室在六楼，便乘电梯上去了。他来到标明“编辑室”的门口，在正要敲门的一瞬间，却踌

蹒跚起来。他傻呼呼地自付道，必定有内务部特务在报社工作。他决定再考虑一下，便乘电梯下来了。电梯在下一层停下时，又进来一些人。其中有个姑娘微笑着问他：“您来这儿有什么事？是不是大使馆要发布什么新闻？”科坚科呆若木鸡，回答不出。电梯到了一楼，他才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大意是说他很忙，然后冲到街上，跳上一辆电车赶回了家。^①

“不要怕她，”当他把电梯上遇到的事告诉妻子时，她安慰说，“她一定是个记者。许多记者参加过大使馆的招待会，她可能在大使馆见过你，他们的记忆力很好。”安娜解释说，即使《渥太华日报》有苏联内务部分子，那也没什么，并不会妨碍他。她又说：“再到报社找找编辑，至少几小时后大使馆才能发现所发生的一切呢。”

伊果尔从衬衣里取出了那些文件。由于天气格外闷热，文件都被汗水浸湿了。把文件弄干后，安娜用一张干净纸把它们包起来交给了丈夫。

伊果尔再次回到报社时已是十点多钟，编辑已经寻欢作乐去了。他顺着楼道来到新闻室，里面挤满了记者和副编辑。他走到离他最近的一张办公桌前，对一个正在打字的人说，他想见负责人。“有件极为重要的事，”他补充说。

这个人把他领进旁边另一个房间里，这儿坐着一位上点年纪戴着绿色眼罩的人，他请科坚科坐下来。科坚科随即拿出文件摊在他面前的办公桌上，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说

^① 科坚科：《这是我的选择》英文版，第302页；蒙哥马利·海德：《沉默的加拿大人》，第229—235页。

这些文件就是在加拿大的苏联特务正在搜集核子机密和原子弹资料的证据。

那个戴眼罩的人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他，随手拿起一些文件看了看，上面全是俄文字母，他一个字也不认识，觉得不值得费力去找一个懂俄文的人来。“对不起，”他说，“这不是我们的事。”接着，他建议科坚科应该去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或等到明天上午来找编辑。

科坚科焦急地解释说，明天早上苏联内务部的人就会跟踪他，甚至还可能杀死他。但是他从报社这个人的表情上看出，这人认为他在发疯。

“对不起，我很忙。”这个人说完便起身走了，撇下时运不济的科坚科孤零零地惶恐不安地坐在那里。科坚科又来到了街上，他意识到现在必须立即去找一位高级官员。他想，司法部长兴许是个有头脑的人。于是他向惠灵顿街的司法部走去。到了那里，加拿大皇家骑警队的一个高个子警察把他拦在门口。听了科坚科的要求后，这位警察很有礼貌但很坚决地回答说：“实在抱歉，现在是深夜，您见不到人，明天再说吧。”“抱歉”一词使得科坚科心神不定。“我迫切需要马上见到部长，”他固执地说，“至少我得给他打个电话。”警察摇摇头说：“这办不到。”

科坚科忧心忡忡地回到家里。“别担心，”安娜爽快地说，“你只能等到明天去见部长。好好睡个觉，你会交上好运的。”

但他仍然担惊受怕，睡不安宁。第二天早上，他和安娜商定应当一起去司法部，而且尽管安娜已经怀孕七个多月，还是应该把安德烈也带上。她还说把文件装在她的皮包里，

因为如果苏联内务部的人真的追踪到他们，会去抓他，安娜是有机会溜掉的。

大约九点钟，司法部刚刚开门不久，他们就来到了。科坚科向接待室的人说有极其紧急的事必须见司法部长。那人疑惑地看着他，接着在电话里和什么人交谈了几分钟，然后把他们领到部长的私人办公室。屋里一位彬彬有礼的男秘书询问他们要谈哪一类问题。科坚科说，这件事至关重要，除了部长本人他对任何人都不敢讲。听他说完，这位秘书进到里间，科坚科听到他在打电话。几分钟后，他回来说：“部长在议会大楼他的另一间办公室里。我带你们去。”

他们来到议会大厦，穿过别致的大厅来到了司法部长路易斯·圣·劳伦特的办公室。科坚科在这见到了另一位秘书，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位秘书说，他有重要的文件，只能让部长亲自过目。但是他又补充了一些细节，说明这事有关间谍活动并且涉及到一些具体人。秘书拿起电话用法语和一个人通话。他虽然听不懂，但知道讲的是他的事，因为他听见提到了他的名字。最后，秘书放下听筒，告诉另一位秘书把科坚科带回司法部大楼等着部长。

科坚科夫妇为了这种事情要在九月六日上午见到一位联邦部长或其他高级官员，简直是困难到了极点，倒霉到了极点。因为这天是新议会开幕的日子，麦肯齐·金总理和所有的部长都得留在议会厅里参加传统的开幕仪式。

七十岁高龄的总理在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来到议会大厦总理办公室。他是单身汉，是自由党的领袖。他见到正在等候他的外交部常务次长诺曼·罗伯逊和外交部的另一名高级官员休姆·朗。他们简要地向总理汇报了从圣·劳伦特那里得

知的有关科坚科的情况。看上去他们两人的神情十分严肃。当晚，麦肯齐·金在日记中写到：

罗伯逊对我说发生了一件麻烦已极的事情。就象到处悬着炸弹，谁也说不准会有多么严重，会发生什么后果。他告诉我，今天上午，刚刚在半小时以前有一个人带着妻子来到司法部长的办公室。那人说他是俄国大使馆的，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而这种遣返后果是必死无疑。他说俄国的民主与我们的不同。

那人还说他掌握着从大使馆里弄到的许多文件，准备交给加拿大政府。这些文件揭露出俄国在加拿大和美国有自己的间谍和秘密机构并且正在从事谍报活动。他说有些间谍就潜伏在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特蒂纽斯的身边，其中的一个人就在我们自己的研究实验室里（看来是想要窃取有关原子弹的秘密情报）。他表明自己是搞通讯密码的……总而言之，他说，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俄国人是真正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罗伯逊已经和圣·劳伦特先生谈过，圣·劳伦特先生认为不见他为好。罗伯逊和休姆·朗征求我的意见，询问是不是不要骑警队来处理他，也不要对他手中的文件采取保护措施。这个人听说部长不见他，就说他立刻死在这里。他已走投无路了，因为使馆的人一打开保险柜就会发现文件不翼而飞，会知道是他拿走了。

我对罗伯逊和休姆·朗两个人说，我认为在参预任何将把加拿大政府与这件事联系起来的行动时，我们应该极为谨慎。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事可能会使